

徐作生 著

中外重大历史之谜

ZHONGWAI ZHONGDA LISHI ZHIMI

第一集

图考

TUK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徐作生 著

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

ZHONGWAI ZHONGDA LISHI ZHIMI TUK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第一集/徐作生著.-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
ISBN 7-5004-5329-9

I 中... II. 徐... III. 世界史-史料 IV. K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6950 号

选题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木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址 <http://www.ca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2

字数 291 千字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十年之功系一谜

1991年1月16日，海湾战争一触即发。中央电视台在报道这一新闻的同时，全文播放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历史考证成果：

“新华社消息：对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明建文帝的下落问题，上海史学工作者徐作生经过七年考证后认为……”

新华社的这篇新闻，几乎被海外所有的华文报纸以醒目标题刊登。美国一家报纸说：“一个中国学者，揭开了五百多年悬而未决的课题，其学术价值与斐然成就令人瞩目。”

1994年8月，新加坡著名学者柯木林先生专程来沪探视徐氏，因故未遇；12月，他再次赴沪，徐感其心诚，遂同邀游吴县，寻访建文帝出亡遗迹。以下就是柯先生发表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5年6月13日和6月14日）的两篇连载报道，原题为：《明惠帝失踪疑案——兼谈揭开谜案的徐作生》。

1399年，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起兵北平，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兵攻陷京师（今南京），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当时皇宫一片火海，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不知去向，成了历史上一大悬案。

明惠帝到底去了哪里？他是否死于火？还是逃亡在外？这个问题不仅长期困扰着明成祖，也困扰了后来的数代皇帝，五百多年来，更成为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

明惠帝不知所终

明成祖在位时，对惠帝的踪迹一直耿耿于怀。永乐年间，成祖派心腹大臣四出访察，有的是明言出使，有的则扮成普通百姓，秘密寻找惠帝下落。私访惠帝最著名的大概是胡濙了。胡濙官至户科给事中，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长，在明成祖在位的二十余年间，他一直奉旨搜索惠帝。郑和下西洋也有察访惠帝的用意，在郑和的使团中就有锦衣卫特务人员跟随，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明神宗对惠帝的下落也颇感兴趣，万历年间，神宗诏访惠帝一案，此时距“靖难之役”已一百七十多年了。即使在明朝灭亡之后，于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的《明史》中，也留下了“(惠)帝不知所终”的记载，可见数百年来，人们对惠帝的去向，都不断地作出种种努力，试图揭开这桩疑案的真相。

明惠帝遁入空门

历史不负有心人，明惠帝的踪迹近年来终于有了落案。上海《文汇报》编辑徐作生，原是学历史出身的，自1983年起迄1990年，他利用7年的时间，查阅大量史料和方志，又赴吴县、太仓、南京、北京实地考察，寻访明惠帝遗迹。在他数次前往江苏吴县鼋山和穹窿山一带进行勘访时，在此找到了惠帝出亡的遗迹遗物，如雕龙柱础、御池、御池桥、神道、方石等。徐作生以文献材料结合实地考察，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明惠帝出亡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不久，转移阵地，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直至1423年病殁于此，葬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由此可见明惠帝没有死于火，而是遁入空门，出家为僧了。

然而，惠帝是怎样逃出南京的？这位逊国之君在当年如此紧锣密鼓的追捕下，其形踪又如何得以保密呢？这一连串的问号，给明史增

添神秘色彩，500年来使人们一直难穷其究。

怀着考史的一种偏执，徐作生从浩瀚史料中，理顺出这样的逻辑：当京师失陷时，明惠帝束手无策，想蹈火自尽，后经群臣劝阻，于是剃去头发，披上黑色僧服，乘着星夜从聚宝门（今中华门）逃到了神乐观。在神乐观住上一宿，然后沿着水关御沟（地下水道）潜行，漏夜逃离南京。从南京逃出后，由水路乘小舟进入太湖，被和尚溥洽藏匿于鼇山普济寺。

溥洽是明惠帝的主录僧，惠帝出逃时剃发为僧，即出自溥洽之手。他因知道惠帝逃跑一事而被成祖禁锢了11年。奇怪的是，溥洽在普济寺被捕，燕兵在苏锡常一带包围搜捕，却不见惠帝踪影。当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保护人来相助，惠帝形踪必定暴露！那么，这个神秘的保护人又是谁呢？

“无冕宰相”姚广孝

根据徐作生的考证，此人就是姚广孝，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是明成祖的心腹谋士，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无冕宰相”。在辅佐成祖夺得帝位后，功成身退，归隐禅寺。明惠帝藏匿于鼇山普济寺，姚广孝是一个知情人，并且曾经与惠帝见过面。未几，事机败露，溥洽被他的一个同僚告了密，被捕入狱，而姚广孝则出于良知，把明惠帝转移到他的佛地之内（姚广孝以成祖敕赐名义，将穹窿山划归为他的佛地，山内不得居民）。

姚广孝卒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临终前，还特地从吴县穹窿山远赴北京，在成祖面前求情，保释因惠帝出亡一案而受累下狱的溥洽。不难想象，当姚广孝死后，穹窿山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具有严密的防范措施，明惠帝的安全也失去了有力的保证。于是，惠帝的踪迹就在姚广孝逝世的第二年（永乐十七年，1419年），被胡濙发现了。

胡濙力保惠帝

至此，徐作生大胆假设：当胡濙知道惠帝的行踪后，在成祖面前力为开脱，以免惠帝一死。成祖也不想杀害这个甘心遁入空门、不与世争的皇侄，以免落得违逆天意、杀侄篡位的恶名，胡濙力保惠帝之举，也正和他的“宽厚、喜怒不形于色”的性格相符合。

胡濙最后一次向成祖报告，是在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当天深夜，胡濙由外地回朝，直奔皇宫，其时成祖已入睡，听到胡濙来朝，立即披衣接见，并谈到“四鼓乃出”。胡濙与成祖交谈了什么？他俩为什么半夜三更才谈完？这是历史留予后人的一段曲笔……

徐作生看出其中奥妙，他由此推断：胡濙最后一次的报告，乃是有关惠帝死亡之事。“惠帝死亡之日盖在永乐二十一年，时年47岁。”这也正与《明史》所载吻合。史载，明成祖直到临死前一年（成祖殁于1424年）才对惠帝一案放下心来。另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是：郑和连续6次下西洋后，成祖从此就再也没有让他出使。郑和第7次下西洋是在宣德五年进行的（1430年）。这不应被视为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与不必再访察惠帝有着内在的联系。

既然前人对惠帝踪迹之研究似已有了“定论”，徐作生为什么还会想到再去考证惠帝一案呢？他当时的思路是怎样的？他怎么会想到惠帝是出亡穹窿山而不是踪迹云南呢？徐作生的考证与前人论证的最大不同之处，是他找到了惠帝陵，以及惠帝出亡的实物史料。根据历史记载，明惠帝死后，成祖曾以“天子礼敛葬”，但南京却没有惠帝的陵墓，徐作生又为何能确定穹窿山的小山丘，当地百姓历来称之为“皇坟”的土堆，就是惠帝陵呢？

我与徐作生素昧平生，1994年8月，我在海南岛旅游，闲来无事，在新华书店购得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晁中辰的名著《明成祖传》来阅读，从而知道了徐作生考证明惠帝出亡穹窿山的论证。回到上海后，托友好与徐作生联系，但缘悭一面，后来才知道他因病住院。同年12

月我再次专程到上海拜会他。1994年12月12日上午，徐作生与其夫人到我下榻的虹桥宾馆来看我，我们相叙甚欢，当下，我就向徐作生提出我的疑问。

500年历史悬案终揭开

徐作生说，他寻访惠帝踪迹的最大考虑，是“在近不在远”。试想，永乐年间，成祖曾多次榜示天下，对出家人进行监控。在这严密搜捕之下，惠帝及其随臣若跋山涉水，千里之行，行踪必定容易败露；再者，事隔一百多年后的万历年间，神宗诏访惠帝一案时，有关惠帝出亡的书籍如《从亡随笔》、《致身录》及《逊国臣记》等，俱在苏州吴县一带问世，而西南或中原各地未见这类书籍。在查阅大量史料和方志时，徐作生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明、清《苏州府志》、《吴县志》上所说的“积翠庵，一名皇驾庵”，实误。根据徐作生考证，皇驾庵即拈花寺，惠帝陵就在拈花寺后。张郁文《木渎小志》记载道：“明建文帝逊国时曾移驾于此。”沿着这条线索，徐作生数次到穹窿山实地勘察，终于揭开了这500年的历史悬案。

“皇陵”头上动土自找麻烦？

在谈到如何确定惠帝陵时，徐作生说，拈花寺后的皇坟，在坟顶上原置有一块正方形大青石，是为陵墓的标识。当地30岁以上的村民都是见证人。可惜这块大青石，“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当地一陆姓农民从坟顶推下山脚，裂成两块，被当作建筑材料，砌在宅基之下，这位农民在次日就暴毙了，因此当地村民迷信说这是翻动皇陵的惩罚。

徐作生说，他本人曾研究过古代帝陵的形制。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许多皇帝的陵寝砌成上圆下方的形状，以附会“天圆地方”之说。明代帝陵的主体建筑为宝顶和方城，宝顶即圆形墓之

顶，方城是宝顶前面的部分。置于穹窿山皇坟顶上（宝顶）的这块方形陵碑（方城），再配上附近的御池、御池桥、神道等，这种简单的帝陵形制，正与《明史》上的“备天子礼敛葬”一语吻合。更何况从文献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历史上有其他皇帝埋葬于此。徐作生因此判断，此乃惠帝陵。而惠帝陵是按照成祖的旨意去做的。

普济寺成采石场

徐作生的论证，真是无懈可击。在我的提议下，他欣然答应带我重访明惠帝遗迹。我们在吴县穹窿山那人烟寂寥的山区内，登上了皇坟宝顶，拍摄许多御池、御池桥、神道、雕龙柱础等惠帝出亡遗迹。当然，惠帝最终的隐匿处皇驾庵（拈花寺）是荡然无存了。我们也不辞旅途劳累，找到了鼋山普济寺遗址，这是溥洽最初藏匿惠帝的地方，亦是溥洽被捕之处。可惜当年的普济寺，如今已成为采石场地，寺庙被拆毁一空，但在原址上仍可寻觅到许多柱础。

徐作生现年46岁，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现为文汇报编辑，是个业余的青年历史学家。二十多年来，除了认真完成本职工作外，常于斗室钻研文史，或负笈远涉考察。

徐作生除了探讨明惠帝的下落外，对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之谜、郑和下西洋所建宝山烽墩等悬案，都有创见和新的提法，尤其在考证古麻刺朗国这一悬案上，他所撰写的《南洋何处“古麻刺朗”》一文，得到菲律宾前任总统阿基诺夫人的赏识，称赞他“为菲中友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徐作生考证古麻刺朗国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其国都即棉兰老岛西南岸海港城市库马拉朗。）

此外，徐作生还参加了《中国文化之谜》、《千古之谜》、《中国历史三百题》三本书的编写工作。由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上海历史学会、郑和研究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先后接纳他为会员或研究员，他还应邀出席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

我之认识徐作生，明惠帝可说是主要牵线人，若干年后，徐作生当与明惠帝齐名。明史研究者在提及惠帝一案时，就不得不想到徐作生——这也正是他多年刻苦钻研的代价。

历史是不会辜负徐作生的。

柯木林

1995年6月于新加坡

序 二

青灯黄卷出成果

1998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美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徐作生先生结下一面之缘，但他的学术文章，却早就“耳濡目染”。

美国的华文报纸，十分关注中国大陆的学术动态，徐作生先生的历史学术论文，如《建文帝出亡穹窿山新证》、《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研究》、《韦羌山蝌蚪文考述》，等等，就曾由新华社、中新社播发或《人民日报》转摘后，许多华文报纸都纷纷予以刊登介绍。

现今的社会，人们受浮躁心理影响，盛行“文化快餐”，写一本洋洋数十万字的书，仅仅数月就付梓，可想而知，这样的书质量水平如何了。徐作生先生研究学问，却是“青灯黄卷冷板凳”，一篇论文，行文万余字，却要花费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考证。所谓“厚积薄发”者是也。如徐先生所言，恋爱时，为了做学问，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他和未婚妻听一场轻音乐会，已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在编辑工作之外，他挤出时间，或涉猎经史典籍，广搜方志碑铭；或负笈远游，采撷山川灵气，着墨甚深。手头这部厚实的书稿，便是他二十多年来的心血结晶。

徐先生著书，思路敏锐活跃，善于捕捉历史悬案中的蛛丝马迹。他对历史的发掘和创新，每每能从人所常见的材料中，得出别人没有得出又能为人信服的结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注重实地考察，而不是死啃史料。他把结婚度蜜月当作最好的实地考察机会，携妻远游，赴古代的蜀身毒道，探究“支那”一词的缘起，行程逾万里。这次考察，他用了将近一个月的休假时间。为了探索佛祖释迦牟尼诞生

地遗址，他应尼泊尔学术界邀请，赴兰毗尼考察。去之前，他广泛阅读经史，尤其是唐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回国后，他写出两万多字的考察报告，并在文汇报发表题为《释迦遗址何处寻，玄奘遗著作指南》的文章。他的一些研究推断，经过两年后，即1996年2月5日，被尼泊尔考古界对传媒公布的新闻所证实。

我们的祖先有句老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作为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学界同好，愿徐先生以壮硕之年持之有恒，时日推移之下，成果累积，益将可期矣！敬此为之序。

Alan S. Wong

黄作述 谨笔

1998年12月于美国旧金山大学

序 三

蛛丝马迹中寻突破口

古老的中国，不仅以具有悠久而灿烂的历史而著称于世，而且以其中存在着许多悬案，使一部中华史册更显得神秘而诱人。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学者，为解开这些历史的疑团，倾注了研究的热情，然而到头来能够解开的却寥寥无几。我面前放着的这部《中外历史之谜图考》，是一部以图文并茂的笔法，专解中外历史上重大悬案的著作，它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不畏艰难、勇于探索的勇气和智慧。

徐作生探索中外历史文化之谜的志向，由来已久。早在上中学时，有一天他听国文先生讲课，“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一节令他梦萦魂绕。他瞪大眼睛，望着那踱着方步，捻着胡须的老学究，痴痴地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像李白一样，解开中国文化的‘谜’呢？”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想法渐渐在心灵中生了根，立志要探索厘清历史文化那令人迷惑的奇妙之点。也许这就是本书诞生的表层动机吧。初中毕业时，因逢十年动乱，他被分配到海上当厨师。这份职业虽不太理想，却使他得以有机会随船游历各地，其间，他注意到历史留下许许多多的“谜文”和悬案，有待后人揭晓。有被称为中华第一部“天书”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有难以读通的好太王碑（在吉林省集安境内鸭绿江畔）；有扑朔迷离的河北磁县的曹操七十二疑冢；有传为仙迹、难能考释的绍兴禹陵峻嵎碑……然而这其中，最令他感兴趣的莫过于那些帝王在驾崩时留给后人的“悬案”了。若能解开其中的一个“谜”，就等于解决了一部断代史中悬而未决的疑点。多么诱人的历史之谜呵！徐作生从研究中国古代帝陵着手，去探索这些历

史之谜，工余时间全泡在图书馆，早出晚归查阅资料，又数易其稿，前后花费十多年心血，而今书终于问世。

在这本书里，徐作生探讨了明建文帝的下落、曹操七十二疑冢之谜、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之谜、郑和下西洋所建宝山烽墩，以及古代蜀身毒道的走向及“China”一词的缘起、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古苏禄国本头公其人其事探究，继之今赴韩国勘访被大唐水军击溃的四百艘倭船沉海地点等悬案，对每一问题都有许多创见和新的提法。

1399年，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1402年，燕王攻陷京师（南京），皇宫中大火熊熊，建文帝不知去向。于是，建文帝的下落，成了一桩历史悬案，五百余年来，关于建文帝下落众说纷纭。清代张廷玉等撰写《明史》，甚至把“踪迹建文”作为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近代则盛行建文帝流亡云南的说法。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没有多少证据。徐作生通过在南京寻访建文帝遗迹，又北上北京多方考证，以后，又数度去江苏吴县鼋山和穹窿山一带进行实地勘访，终于在此找到了建文帝出亡的遗迹、遗物，如雕龙柱础、御池、御池桥、神道、方台等。由此，他对建文帝下落作出结论：当年建文帝出亡，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未几事泄，救护者溥洽为此系狱，建文帝转匿于穹窿山，时姚广孝归隐禅寺，穹窿山划为他的佛地，山内无居民，在姚的监护下，建文帝隐匿穹窿山皇驾庵，直至1423年病歿于此，葬于皇驾庵后的小山坡上。徐作生的这篇学术论文发表以后，1998年6月，考古工作者于南京明城墙内发现涵洞，专家推断这可能与建文帝出亡史事有关。

为了探究曹操陵寝之谜，徐作生不仅查遍有关史料，更实地调查有关遗迹。1984年夏，徐作生利用大学生暑假社会考察之机（当时他在上海教育学院带薪读书），自费从上海来到河北临漳县三台村古邺城遗址，对无标识可辨的曹操陵寝进行探访踏勘。曹操生性多疑，恐死后别人会掘他的陵墓，遂立下遗嘱，墓地“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又设七十二疑冢，使人真伪莫辨。疑冢从临漳县讲武城起始，由南往北，直至磁州而止，一座座如小山布列。徐作生根据现场遗留的砖瓦

及部分已被盗挖的墓冢遗存考证分析，七十二疑冢可能系曹操生前所设，以惑后人；里面长眠的北齐王公命妇，则是“坐享其成”。徐作生得出的这一结论，后为考古工作者以考古发掘的实物所证实。

明朝永乐年间，由于郑和下西洋大力发展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海外各国的国王及其使节纷纷来中国访问，大大加深了中国与海外各国的传统友谊。仅自永乐六年至永乐十八年（1408—1420年）的12年中，就有渤泥、满刺加、苏禄、古麻刺朗四个国家的国王来华访问，其中渤泥、苏禄、古麻刺朗三国国王在华访问期间，都因病逝世并安葬于中国境内。在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中，惟有古麻刺朗国的地望、国属以及逝世于中国的古麻刺朗国国王斡刺义亦敦奔的葬地不明，长期以来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一个疑案。徐作生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并亲赴福州实地勘访，解开了这一悬案。他撰写的《古麻刺朗国及其王陵研究》一文，从中外史籍中披露的材料，并结合对王陵的实地考察，认为古麻刺朗国在今菲律宾棉兰老岛，其国都即棉兰老岛西南岸海港城市库马拉朗，古麻刺朗国王斡刺义亦敦奔王陵在福建省福州市西郊凤凰池村茶园山麓。

其时，正值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到福建龙海县鸿渐村谒祖认亲，她在祖屋里看到了徐作生的这篇论文，非常高兴，便拜托她的堂叔许源兴写信给徐作生，称赞他“为菲中友谊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1998年11月26日，他应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邀请，赴菲律宾讲学，到过马尼拉、宿雾、三宝颜、苏禄诸城市学术访问。其间，由菲华友协安排，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踏上古麻刺朗故地，进行学术之旅。

当时，菲国学术界同仁曾好心地劝他放弃这次旅行，因为那里绑匪活动十分猖獗，而像徐先生这样有“身价”的学者，更是被绑架的对象。他一笑置之说，我来一次已十分不易，更何况已快踏上那片朝思暮想的土地。

当徐作生在600年前的古麻刺朗国属地——三宝颜勘访时，心情是何等地激动！在位于市郊的清真寺（今为棉岛穆斯林总督府）高大的穹窿形天顶上，他看到这样一幅幅珍贵的壁画：头缠皂纛的古麻刺

朗国百姓，一个个围坐在一位鬢须皆白的长老身旁，听他讲述遥远的往事——威严的国王在身着水印花布臣民的簇拥下，正缓步走来。这位国王好像刚刚从遥远的大明皇朝踏波归来。他也许是《明史》上记载的新国王刺苾。这幅壁画是用夸张、想象的艺术手法来表现主题，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清真寺穹窿形天顶上，还有另一幅壁画，画面上，留着辫子的清朝华商随船漂至南瀛，与岛民做生意，他们彼此打着手势来讲价钱；华商身旁，则堆满了陶罐和瓷器，铜钱洒得满地都是……

这次实地考察，完全验证了1987年他在北戴河学术会议上的论文所作的考证是正确的，令人心悦诚服的。

徐作生取得的这项重要成果，不仅解决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上的一桩疑案，而且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发展菲中友谊做出了贡献。

由于在长期刻苦的自学中打下了扎实的学问根底，积累起丰富的学识，徐作生往往能从从不引人注意的史料中，得到十分有价值的发现。他从明成祖的一块御碑碑铭中，发现外高桥宝山烽墩是郑和下西洋时期的遗物。为了能确证宝山烽墩及其同时代的城堡沉江地点，他利用假日，一次又一次奔赴高桥镇海滨勘访。乡间不通汽车，他就靠步行，沿长江口村庄询问老人，查找遗迹，终于在海滨村以西找到了明初清浦寨遗迹，从而确定了洪武年间清浦寨的方位，并绘出图表，标明了宝山烽墩及城堡的沉江地点，解决了中国航标史上的一大疑案。徐作生的这一成果发表两年以后，航道专家、高级工程师朱国贤从文献及水下考察等方面确证，外高桥江底障碍物就是明代塌陷入江的烽墩及其他建筑物。这一科研成果现在已被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上，不久的将来，在这段水域上将会出现几十个万吨级码头和一座火力发电厂。

二十多年来，徐作生除了认真完成本职工作之外，或于斗室内耙梳史料，或负笈远涉考察，孜孜不倦地钻研史学和考古。为了在那有限的工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他要付出比一般学者多几倍的努力，常常过着一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徐作生后来回忆说，最艰苦的那几年，

倘能和未婚妻坐在剧院里欣赏一场轻音乐会，那简直是一种十分奢侈的享受了。在艰苦的治学中，徐作生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善于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突破口，寒暑潜研，乐此不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十年内，他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内容涉及帝陵形制、古代科技、史坛人物以及考古、佛学、方志等诸方面。这些文章的绝大部分，或是被国内外学术刊物转载、摘引，或是被收入专类论著。此外，他还参加了《中国文化之谜》、《千古之谜》、《中国历史三百题》三本书的编写工作，由于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上海历史学会、郑和研究会、中外关系史学会先后接纳他为会员或研究员，他还应邀多次出席了较高规格的国际学术会议。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当年，徐作生尚没有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时，他把李白《行路难》里的这两句诗刻成匾，挂在斗室内，以激励自己。而今，他的这部专著即将付梓，他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满足，而是仍以这两句诗来激励自己在史学的神秘殿堂里锲而不舍的“探秘”，去摘取一个又一个果实，努力向着那光辉的顶峰攀登。徐作生解决中外历史悬案的丰硕成果，固然是史学园地的一朵奇葩，而他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更值得人们学习。

笔者治史，也曾经历过长期艰苦自学的道路，对其中的甘苦自是更能引起共鸣，故乐为本书作序。

郑一钧

1999年岁末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